



网络行动的发展历程与概念阐释

许 玲 何道宽

摘 要: 网络行动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网络行动一词的出现,彰显了互联网时代的公民希冀通过新媒介,将争取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民主期望付诸积极、理性实践的渴求。网络行动研究的核心不仅是探讨新媒介与公民行动的关系问题,更是要深层考量已有的制度性力量的逻辑与资源对传播技术所进行的动态建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决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关键词: 网络行动;新政治文化;新媒介;进步政治

“网络行动”一词,其实是对近几年频繁出现在英语著作及英文报纸杂志中的 *Internet Activism*、*Net-activism*、*E-activism*、*Cyber-activism*、*Online Activism*、*Networked Activism* 等词汇的统一译称。在相关的理论著述及新闻作品中,围绕此关键词进行的现象描述,皆聚焦于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一些中西方国家的草根活动分子围绕某一特定的、以某种“共同善”^①为旨向的社会或政治议题,通过电子邮件、网站、博客、手机短信、微博等新媒介技术,组织动员广大的普通公民进行线上线下的合作,并最终在实现其相关利益诉求的同时,增强普通公民对公权力阶层的政治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到相关公共政策的修订或制订过程中。对于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的传统、官僚科层化的政治传播过程而言,这种虚拟网络化的草根政治行动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挑战。

一、新政治文化的兴起

20 世纪后半叶,滥觞于西欧和北欧的新政治文化在一些地区已然成为主流文化,政治游戏的规则得以重新界定,并为网络行动的兴起设定了各种因果流向。首先,随着新政治文化的发展,政党和政府更加关怀民众、体察民情。这些政治变革的核心是公民权力与权利的上扬,以及与之相对的传统政治力量的式微。其次,新媒介使原有的、操控在信息传播把关人和高级媒体专业人员手中的仪式化的公共传播,被赋予了公民协商和公众参与决策的可能性,公民社群内部及社群之间也能通过新媒介连接起来,互相扶持,协调其共同的决策行动。这些模式化而又动态发展的价值和规范,为网络行动的全球传播界定了民主、平等、自由等一般价值与制度性角色。

新政治文化的诞生稍早。20 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政治、政党政治

^① 共同善(common or public goods),是指由公民团体提供的作为激励因素来吸引人们加入本团体的益处,且必须是共享的利益,包括社群福祉、团结、承诺和归属。对共同善的追求要求公民有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私人利益要有系统地为公利服务。见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第 303 页。赵鼎新在《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载《领导者》杂志第 18 期)中认为,正面的社会共同善包括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等。

退潮或瓦解,新政治文化兴起,为网络行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情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

(一)衰落的等级构架

财富的不断增长使得原有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弱化,传统的政治等级构架也随之面临崩溃,这些是促成网络行动兴起的深层结构动因。公民社会与新政治文化相生相伴,政府更加注重倾听民意,民众更加热心表达诉求。在政治、经济、财政、福利政策上,政府都更加注意平衡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团体的利益诉求。

(二)新社会问题的兴起

政治参与、环境保护、公民民主(尤其是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等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关的新政治问题上升到突出的地位,将一般公民的权利延伸到少数派边缘群体和新的政策领域,从而为网络行动的兴起积累了社会资本与结构性压力。

(三)新媒介政治意义的上升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信息的成本、流动方式及其传播本质。民用电信技术改变了广播和电视的权力集中在精英手中的现状,成为组织大众运动的一种强大工具,任何公民都能利用它进行政治组织行动。Chang Woo-Young以韩国为例,指出“公民网络参与”和“在线互动”是理解2002年韩国大选后在线媒体政治影响的两个关键词。他还归纳了公民网络参与的四种特征:(1)方便具体信息的获取;(2)自由表达与交换意见;(3)政治化的议程所导致的网络行动;(4)网络群体的积极形成。Chang Woo-Young指出,韩国的例子说明公民的电子参与甚至可能发展成为线下的社会动员^②。

网络行动是新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反叛等级体制的具体体现。综合上述,在当下这种围绕社会问题组织起来的、受自愿群体领导的“新政治”情境中,新政治文化成为网络行动诞生的必备条件。

二、网络行动的源起

据大多数传播学者的认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墨西哥的“萨帕塔人民运动”(the Zapatistas),是第一次具有跨国影响力的草根网络行动。在此之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随着万维网的引入,互联网在一些发达国家迅速兴起。当时以电子邮件、网站为代表的新的媒介技术开始被活动分子用来服务于自身的政治意图,有计划、有步骤地与他们组织或参与的政治行动相结合。如在1986年,法国学生便利用当时类似于后来互联网的Minitel系统,联合协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抗争运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让活动分子看到,投票、筹款、游说、征募志愿者、建立政治社群、组织协调等公民行动能够变得如此迅捷与富有成效。在1994年的“萨帕塔人民运动”中,人们惊异地发现,有关这一运动的新闻传播很快,其动员速度也十分惊人。它以反帝、坚持宪法、公平及正义作为斗争口号(后又将其扩展为“印地安人的权利、民主和正义,体面的生活标准,经济发展与妇女权利”)。对墨西哥腐败的政治制度和不平等经济状况的不满,是促成当地和国外的行动者(大多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平等合作的跨国行动网络的基础,而运动中所采用的手段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比如,萨帕塔组织有自己的主页和常见问题解答(FAQ)的网址,在万维网上有大量与其相关的链接,包括公报、背景信息、新闻、图片、文章及其他形式的资料,“Chiapas-1”还是互联网上被订阅最多的电子邮件转发系统之一。萨帕塔组织的成员不断将对墨西哥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发表在互联网上,运动领导者的公报也直接通过互联网发布。

随着起义者与政府冲突的持续,一个由电子邮件转发系统和许多以这一事件为主题的不同网站所形成的网络结构浮现出来。在美国,由纽约大学研究生瑞(Wray)及其同伴成立的“电子抗议剧场”(Electronic Disturbance Theater, EDT)成功引导了一次网络静坐,通过他们所开发的“FloodNet”引擎使一个万维网浏览器以每分钟几次的频率自动重复下载一个目标网站,有效地阻止了对墨西哥总统 Zedillo

①特里·克拉克、文森特·霍夫曼-马丁诺:《新政治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②Chang Woo-you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et and Empowerment of Citizens”, *Civil Society and NGO* 2003, 1(2), p. 46.

网站的进入。瑞声称有超过 8000 人参与了这次行动。EDT 还攻击了五角大楼的网站,因为美国政府是墨西哥政府的支持者,压迫墨西哥的原住民^①。网络传播使萨帕塔运动能够在没有政府把控制制和审查的情况下获得自己的信息,电子邮件的相互传递也推动了观察家之间的讨论,全世界有 40 多个国家出现了支持萨帕塔运动的抗议和倡议行动组织。尽管墨西哥政府期望将冲突局势控制在本地或区域范围内,萨帕塔组织却极力避免运动被当成是一国处理非法分子或恐怖分子的内部安全事务问题。大量以“人权”和“民主”为标识的关于萨帕塔运动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国际公民社会开始呼吁对这个问题采取非军事途径解决。迫于舆论压力,在运动进行到第 12 天时,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对起义的暴力镇压。

萨帕塔运动对计算机化的通讯工具的使用,颠覆了武装革命以及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范式,不仅对当地的民主政治产生深刻影响,还超越国界甚至牵动整个世界的政治局势,成为大多数网络行动研究者分析论述的起点。在一些研究者眼里,萨帕塔主义者是合法的起义者,是墨西哥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所反抗的是美国帝国主义外来统治的新形式^②,从而打破了传统上认为反叛即是非法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萨帕塔运动是一次全球性的网络行动,它显示了互联网能够增加跨国行动者的倡议网络通过“信息政治”运转的可能性及其使信息迅速发挥最大效用的能力。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政治过程正逐渐被移上互联网,个人、利益集团甚至许多国家都利用新媒介作为推进其政治目标的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由于萨帕塔运动极大地展现了普通人关于互联网的想象,政治活动分子也开始效仿萨帕塔主义者将互联网作为运动组织和传播的工具。1999 年 10 月 4 日,美国《商业周刊》刊载了《没有界限的活动分子》一文,文章指出,萨帕塔运动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虚拟共同体——的产生,少数精通网络的活动分子将互联网作为一种可用来进行支持动员活动、筹集资金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向当地的决策者施加压力^③。

三、网络行动的发展

除了墨西哥萨帕塔人民运动外,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起,一系列针对政府、企业和文化机构的反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抗议行动,充分利用新媒介进行组织和表达^④,被称作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運動”^⑤。较为典型的如在西雅图、魁北克和日内瓦发生的反世界贸易组织的网络抗议行动。在这场国际性的反全球化运动中,网络行动者们通过互联网实现国际性的联合,如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全球行动”(PGA)联盟,在 1998 年 5 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召开会议期间,试图通过数字化直接行动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行动与 WTO 进行抗争。另一个著名的反全球化运动化网站 S11.org 在 2000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墨尔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会议期间,通过电子邮件讨论清单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些澳大利亚亲和群体通过在线的 S11 联盟所提供的信息协调其计划,这些信息不仅随时随地都能获得,且其超文本的形式也使对连续反映运动发展状况内容的编辑变得容易,同时熟悉这种结构的用户群也被固定下来。S11.org 网站不仅提供组织的信息,也刊载其成员关于资本全球化的诱牲性批评^⑥。它集中了分散的行动者联盟的集体智慧和努力,不断推动跨地区、联合形式的政治,从而产生了一种螺旋式的协作效应^⑦。也是在互联网的动员协调下,1999 年 6 月,全世界 75 个国家爆发了针对世界银行业及金融中心的示威。在这次国际性的运动之前,组织者利用电子邮件积极进行舆论传

① Andrew Cababrese, "Virtual Nonviolence? Civil Disobedience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fo*, 2004, 6(5), p. 331.

②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第 84 页。

③ 秦章:《关于“互联网政治”的一些资料》,载《当代思潮》2000 年第 6 期,第 56 页。

④ Richard Kahn, Douglas Kellner, "New Media and Internet Activism: from the 'Battle of Seattle' to Blogg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1), p. 87.

⑤ Manuel Castells,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42.

⑥ Susan Luckman, Guy Redden, "The Sense of Translocal Community: Mediating S11", *To The Quick* 2001, (4), p. 21.

⑦ Guy Redden, *Networking Dissent: the Internet and the Anti-globalization Movement*, 2001, <http://www.arts.uwa.edu.au/MotsPluriels/MP1801gr.html>.

播及鼓励参与,伦敦抗议活动的现场录像也被发布在了网站上,其后续报道和相关图片也不断出现,这些媒介使用的策略与模式在后来反 IMF 和反 WTO 的全球抗议活动中被延续下来。在“为西雅图而战”的反 WTO 行动中,为了抗议主流媒体对此次运动的消极报道,媒体行动者还成立了“独立媒体中心”(IMC 或 IndyMedia)。这个中心使得有关运动发生原因的文本、图片、视频和音频得以迅速传播,并不断更新与运动态势相关的讯息,任何人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在线粘贴信息。在它的保护下,全球网络行动者群体网站大量涌现。

在成功利用互联网组织了大范围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示威后,网络行动者们又发动了在布拉格、魁北克、热那亚和波尔图的反多国机构和论坛的运动。他们进一步深入了数字化合作,使用电子邮件、网站和开源软件来组织和协调行动、分享信息、编写文件,也设立一些临时的媒体网络中心传播非主流的信息,用一些新的技术进行实验,并交换意见、分享资源。这些极为重要的社会动员均由许多非主流的全球运动构成,一些非政府组织及跨国倡议网络围绕权利、正义以及环境等问题,利用新媒介主导了不同类型的抗议性的跨国动员、示威和运动。这些新型的、与以往的社会运动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抗议运动呈现出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同时又形成了劳工、环保分子、女性主义者以及反战分子的网状联合,集体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其军事同盟。里查德·康和道格拉斯·凯尔纳评论道:“一场国际性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制度及其相关全球化政策的抗议运动浮出水面,民主、社会正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理念得到拥护。人们逐渐感到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可能会以一种民主解放的方式来运用互联网,包涵广泛的平民主义政治景观变成了标准。”^①

21 世纪初,随着“9·11”恐怖袭击及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入侵,一场新的政治行动浪潮兴起,互联网在其中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2002 年底和 2003 年初,全球反战运动逐渐成为布什政府对伊政策和不断加剧的战争威胁的重大挑战。这些反战和平运动都是被一些政治群体(如 MoveOn、ANSWER)或一些庞大但通常不稳定的联盟(United for Peace & Justice、Stop the War Coalition)所组织和发动起来的,这些联盟往往由一些有着不同历史、文化、目标和动机的群体组成,在运动高峰时全球有 600 个城市的 1000 多万人参加^②,所有这些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新媒介资源推进运动,从而增强了这些运动的象征性在场和效用。

对于正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技术竞争以及世界地缘政治重构的中国而言,西方网络行动中所体现的新媒介的政治动员可能性与民主潜力,也为我国进行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等制度建设与思想创新带来了信息化的机遇与考验。2007 年,厦门 PX 项目、山西黑窑案等事件就让国人在短短几个月中或目睹、或亲历了一次次利用新媒介进行的波及面广、旨意性强的草根抗议行动,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了包括活动分子、非政府组织、政治领导人和相关专业人士的重视,并最终促成了党和政府在制度政策层面上的修正,2007 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公共事件元年。2008 年伊始,在反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报道北京奥运的在线签名活动、抗议巴黎火炬传递的手机短信动员等声势浩大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技术民主实践中,中国民众所表现出来的自发批判的价值取向和主体能动性、理性与激情相互交织的务实与建设性也给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其原有的对中国问题的解释框架及叙事发生转向。在 5·12 汶川地震中,手机、博客等新媒介也充当了集合民间群智群力的寻呼中心与中介平台的角色,为透明灾情、消除恐慌、筹集捐款等公民行动带来了良好的推动作用。2009 年,“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中的群众草根反讽,让越来越公民化的互联网成为群体性事件正处于“高位运行”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出口。在 2010 年的温州乐清钱云会案、上海的“11·15”火灾、“我爸是李刚”事件以及 2011 年的郭美美炫富风波中,无数网民在网络强大的信息发布与动员能力的推动和感召下,打破传统媒体垄断的传播格局,自由而真实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进行激烈辩论,开启一时思想之风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公共议程设置。截至 2011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达 4.85

①Richard Kahn, Douglas Kellner. “New Media and Internet Activism: From the ‘Battle of Seattle’ to Blogg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1), p. 87.

②BBC. Millions Join Global Anti-War Protests, <http://news.bbc.co.uk>, 2003-02-17.

亿,手机网民 3.18 亿,五年间,各种各样的城市业主的维权行动,民间慈善救助行动,环境运动等都刻上了新媒介的烙印,社会对于网络公民行动的关注已经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2009 年,《南方人物周刊》第 27 期的《网络行动正逢其时》一文中正式出现“网络行动”的说法,将网络作为公民行动的策源地。

四、网络行动的概念阐释

网络行动代表了一系列以新媒介为中介的社会和政治行动,蕴含了当前媒介环境中政治行动的两大大新特征:一是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作为主导性的政治传播工具,二是新媒介在发挥其信息传播优势的同时,也构建出了一种与政治行动本身的网状结构有着惊人相似的社会网络。“网络”不仅是对以新媒介为平台的强调,也突出了这种新型的政治行动是以“社会网络”作为其组织形式的。进一步而言,活动分子个人不仅嵌入在某个社会网络中,也置身于一个制度网络中。在某个既定的制度背景中,人们通过制度认可的认知和联合形式组织起来,利用制度所要求的策略,使用新技术追求制度提供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现存的行动模式得到重新阐释,行动者的集中行动所产生的力量被增强。路易斯·芒福德曾指出,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自动地应用于社会,而是需要政治上的一些灵活的创新与适应。这是理解网络行动概念内涵的认识论前提。

从已有的网络行动研究来看,与网络行动相关的理论话语被置于宪政框架下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共同体内,诚如巴利·黑格(Barry N. Hague)和布赖恩·洛德(Brian D. Loader)所言:“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要理解国家的作用,……国家是整个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它表达和组织了一个既定时空中的社会和文化力量”^①。因此,当桑德尔·维格(Sandor Vegh)给出了关于网络行动的定义——“依靠互联网、且受政治驱动的运动”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互联网被用于在线行动中,用来增强传统的倡议技巧”;另一方面,对于作为网络行动主体的活动分子群体而言,其行动既彰显了技术的运作方式与使用模式,又隐含着由制度所界定的设计与结构安排。我们所在的这个互联的世界,其互联形式是在一个由制度的主导性规范所组织的框架中协商过的,一系列的角色、关系及附带的规范、表征、动机、期望和策略都由制度来界定。制度是一种互动模式,信息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我们认为,网络行动研究在技术和社会这两种因素间并不作单向取舍,而是置于具体的情境中去考察,将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性的行动与协商作为其理论建构的永续的场地。

五、小 结

新媒介扩大了议题政治的常规程序,增强了活动分子的自主能力,但它自身并不能改变现存的社会力量,而仅仅起增强这些力量、扩大政治过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介与政治过程的互动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政治行动者的策略,以及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政治属性之间的特有互动;另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利用新媒介进行变革的能力与方式取决于传播的情境(条件)而非媒介本身,在新媒介与政治互动的张力空间内,这些被增强了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现实政治。还有,网络行动研究的核心不仅是探讨新媒介与公民行动的关系问题,更是要深层考量已有的制度性力量的逻辑与资源对传播技术所进行的动态建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决策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作者简介:许 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9。

何道宽,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10YJC860048)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 13 页。